

以经术为治术

范广欣 著

晚清湖南理学家的

经世思想

南京大学出版社

以经术为治术

范广欣 著

晚清湖南理学家的

经世思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经术为治术:晚清湖南理学家的经世思想/范广欣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305-17617-3

I. ①以… II. ①范… III. ①经学—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Z126.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972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以经术为治术——晚清湖南理学家的经世思想
著 者 范广欣
责任编辑 芮逸敏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扬州江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6.25 字数 394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7617-3
定 价 50.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老师张灏教授

目 录

绪 论	1
一、晚清湖南理学家及其学问与事功	1
二、以往的研究成果及其不足之处	15
三、基本构思与研究方法	23

第一部分

“以经术为治术”的理论创发

第一章 现实感与救世精神:刘蓉对理想程朱的建构	31
一、《思辨录疑义》对陆世仪的主要批评	37
二、程朱、陆王之辨的现实意义	57
三、现实感和救世精神	71
第二章 从批判到参与:太平天国战争前罗泽南的转向	87
一、批判意识与转向契机并存	96
二、转向的宣言	130
三、参与现实的两种途径	143
第三章 从义理到经世:郭嵩焘对朱子的继承和质疑	168
一、从《大学章句质疑》看汉学、宋学和经世之学的整合	172
二、《中庸章句质疑》中的事功和礼	192

第二部分

“以经术为治术”的实践：曾国藩“礼学经世”说与同治中兴

引 言	225
第四章 “礼学经世”说的提出及其内容和特点	240
一、礼的涵义和礼学研究的对象	241
二、“礼统”的建构及其两大特点	249
三、经济与经世	257
第五章 “礼学经世”提出的学术源流和社会历史背景	262
一、学术源流：从理学到礼学	262
二、社会历史背景：送痘神与求雨求晴	275
第六章 “礼学经世”的运用和局限	303
一、礼学齐家	309
二、礼学治军	314
三、礼学中兴	356

第三部分

“以经术为治术”的实践：郭嵩焘对“怀柔远人”的诠释与近代外交

引 言	373
第七章 郭嵩焘与“怀柔远人”的另一诠释传统	376
一、“怀柔远人”在中国传统文献中的源流和发展	383
二、郭嵩焘“怀柔远人”观念的形成	387
第八章 郭嵩焘“远人”观念的变迁	397
一、署理广东巡抚：“远人”从军事威胁转变为谈判对象	400
二、出使前后：深入了解“远人”，追求和平富强	407
第九章 从三代之礼到万国公法	427
一、郭嵩焘与丁韪良译《万国公法》	428

二、郭嵩焘对万国公法体系的认识	440
三、郭嵩焘对万国公法的运用	448
结 论	466
一、“以经术为治术”：义理、考据和“经世之学”的整合	466
二、“以经术为治术”的成就和局限：对“礼学经世”路线的 再思考	476
三、湖南理学家“以经术为治术”在晚清经世传统发展中的位 置	479
四、湖南理学家精神遗产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487
参考书目	494

绪 论

一、晚清湖南理学家及其学问与事功

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晚清湖南理学家四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刘蓉、罗泽南、郭嵩焘和曾国藩，探讨他们在道咸同光前后四十年间如何利用儒家传统学术所提供的资源为平乱和御侮的政治服务。以下首先对理学复兴、晚清湖南理学家、以经术为治术等核心观念作初步介绍。

1. 理学复兴和晚清湖南理学家

本书所指的理学不是北宋以来兴起的与汉唐注疏之学相区别

的心性义理之学的总称,而是特指程朱理学,并不包括陆王心学。^①

观察中国历史上的程朱理学首先必须明白它既是一个思想学术系统,同时又被明清两代尊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学术流派的程朱理学与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从清朝定鼎到戊戌维新,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始终是《四书集注》等理学经典,程朱理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从来没有动摇,另一方面就全国范围来讲读书人的学术兴趣和风气却发生了几次深刻的变化,乾嘉时期考据学风行一时,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我们可以看到考据学已经从长江流域挺进北京占据学术界的中心地位,嘉道以后随着国家权力的衰朽和社会政治危机的加深,桐城派、以《皇朝经世文编》的问世为标志的“经世学派”、公羊—今文学派和作为学术流派的理学纷纷提出对考据学流弊的批

① 传统上北宋以来兴起的心性义理之学(统称道学或理学)被认为有两个主要的分支:程(颐)朱和陆王。南宋初年兴起的湖湘之学,以胡安国、胡宏、张栻为代表,传统上并不受到特别重视。牟宗三先生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提出质疑,认为湖湘学上承北宋诸儒下接刘宗周,实为道学正宗,与程朱、陆王都有区别。(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二,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版,第429—434页。)我认为晚清湖南理学主要是程朱理学的复兴,而与上述湖湘学派无直接渊源。鉴于牟先生的观点与本书并无直接关系,所以下文仍然因循旧说。

评和自己挽救衰世的方案。^① 因为与官方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也因为各地的读书人和书院里面仍然保留相当大的影响力,程朱理学逐渐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咸同年间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许多理学出身的人投笔从戎,战功卓著,芟夷大难之后更以封疆大吏的身份进一步平定内乱,主持自强运动,成为清朝中兴的支柱,在他们的提倡下,理学在中央和地方的强势地位一直维持到光绪中期前后。^②

在晚清理学复兴的过程中,湖南理学家起到关键作用。即使乾嘉考据学鼎盛之际,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湖南各大书院理学思想仍占主导地位,道光年间创办的湘水校经堂是湖南考据学的主要基地,但其创办者吴荣光也不忘强调它的学术主旨是汉学(考据学)与宋学(理学)并重。与咸同年间崛起的理学家们关系密切的陶澍、贺长龄兄弟,虽然以“经世实学”见长,强调学问有益实用,也都推崇理学。^③ 以曾国藩等人为代表的湖南理学家,在学问上,是

① 桐城派与程朱理学渊源甚深,在一些基本观念上却仍然有分别,比如“文以载道”的观念,曾国藩、郭嵩焘因师法桐城都基本接受,而刘蓉、罗泽南转向理学之后则都否定自己早年学文的经历,刘蓉更就这个问题与曾国藩反复辩难。至于“经世学派”,本书认为这个称呼有商榷的余地,因为儒家传统向来讲究经世致用,乾嘉汉学一度发展出为学问而学问的倾向,在儒学思想史上并非主流,清朝的统治危机浮现以后,新兴的各家各派均主张恢复经世致用的传统,因此“经世”并不是这一学派的独占的特点;另外,《皇朝经世文编》主要探讨官僚体制如何运作,标榜“实用”和“当代”两个准则,也不足以概括经世的全部面向。关于《皇朝经世文编》,见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53页。

② 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5,34—41页。

③ 朱汉民、陈谷嘉:《湖湘学派源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338,356—360页。

理学复兴的关键人物，他们在整理诠释古籍、批判王学和乾嘉考据学流弊方面做过许多踏实的工作，湮没两百年的王夫之的著作也经过他们的努力才得到发掘整理和重视；同时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乾嘉考据学影响，一些人更明确地提出汉宋合流的口号，为清朝学术乃至两千年传统学问的重新整合走出重要的一步。在政治上，他们首先构成了湘军集团的骨干，为镇压太平军，彻底平定内乱立下汗马功劳；其后又在自强运动、洋务运动里面担当重要的角色，无论褒贬与否，谁都不能否认他们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晚清湖南理学家在道光年间崭露头角，奠定学问基础，在咸同年间逐步登上政治权力巅峰，光绪中叶以后才逐渐衰落，前后四十多年；出身湖南省各地，足迹不仅踏遍大半个中国，还有人远赴域外，可谓人物众多，纷繁复杂。本书中选择刘蓉（1816—1873）、罗泽南（1807—1856）、曾国藩（1811—1872）、郭嵩焘（1818—1891）四人为研究重点，理由如下：

第一、这四个人在儒家传统学问和政治事功上都有代表性，而且他们的学问和事功紧密相连。刘蓉在几个人中治理学较早，用功较深，经常在理学修养上提点其他三人。他在事功上最突出的是军事才能，随骆秉章入川以后，首先指挥湘军打垮在云南造反攻入四川的蓝大顺军，被称为“赛诸葛”，又联合各路土司在大渡河边截击太平天国石达开部，迫使其束手就擒。他的学术著作流传下来的只有《思辨录疑义》一卷，却涉及湖南理学许多共通的问题，比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以及清朝汉学的关系、工具理性与救世精神，等等。罗泽南早年以布衣身份在家讲学，组织湘勇保卫长沙之前，已有《姚江学辩》、《读孟子札记》、《周易附说》、《人极衍义》、《西铭讲义》等著作宏扬程朱之学。从军以后，屡获战功，他早年讲学时期培养的弟子很多都成为湘军干将，曾国藩就是接受其建议先

收复武昌,再攻取九江,最后夺取南京,才奠定了胜利的基础。郭嵩焘,历任广东署理巡抚、兵部侍郎和出使英法钦差大臣等职,在自强运动和外交方面多有创见。因为特立独行,所以仕途不顺,长时间赋闲在家,在传统学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生前出版的就有《大学章句质疑》、《中庸章句质疑》、《礼记质疑》等,另外还有《绥边征实》,总结历史御夷经验教训,为外交工作提供借鉴。众所周知,曾国藩是湘军统帅,“中兴”第一名臣,他虽然没有留下什么系统的学术著作,却编纂了颇有影响的《经史百家杂钞》,留下相当数量的读书笔记,检查其日记可以发现他终身读书不断,而且一直思考如何将读书心得应用于政事。他的书信和文章提出了一些重要主张,如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分离(却仍接受其领导)、汉宋兼容、礼学经世,等等,为传统学术的分殊、整合和应变开辟新方向。^①

相比之下,其他湘籍名人或者偏于道德心性之学而不以事功闻名,或者虽然事功卓著却缺少学术著作,或者不以理学闻名而有其他学术传承。湖南理学家最早闻名的是唐鉴,道光年间倭仁、曾国藩和郭嵩焘都曾向唐鉴问学,罗泽南与唐鉴相见也曾论学甚欢。但是,唐鉴将主要精力放在学理的论争上,他积极维护程朱道统,批判陆王心学,同时贬抑考据和文辞之学,在事功上成就并不突出,而且他告诫曾国藩“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不愿给予“经济之学”以独立地位,也未脱传统理学窠臼。^②

胡林翼在湘军里面的地位仅次于曾国藩,据说他在行军打仗

① 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台北:广文书局,1978年版,第419—437页。

② 有关唐鉴学术思想,可参见王继平主编:《晚清湖南学术思想史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53页。告诫曾国藩事,见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7—1989年版一,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第92页。

的空隙里面还不忘与老儒讲习《论语》。^①但是,他的主要精力都消耗在军旅生活里面,并未留下什么学术著作讨论儒家经典文献。他在事功方面的突出贡献在军事,相应的,他招揽组织人才编辑《读史兵略》、《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均与兵法和地理相关。这两部作品,都不是他个人的创作,而且与儒家传统学问的核心,即经学,关系不大。^②同样,左宗棠虽然以理学为依归,但他最重视的也是“经世实学”,强调实用,却并不与经典密切联系。^③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湘籍学者,虽然与湘军集团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本身却不能算是理学中人,比如王闿运就以今文经学著名,王先谦则是古文经学的大师。

第二、与其他湖南理学家相比,这四个人之间的确有更亲密的学术和私人关系,更频繁的交流,我们可以把他们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这一点前人多有注意,陆宝千在《刘蓉年谱》自序里面就讲“逊清道咸时代,湖湘之间,罗罗山(泽南)、刘霞仙(蓉)、曾涤生(国藩)、郭筠仙(嵩焘)辈皆从事于程朱之学。此四人者,先之以友朋,继之以昏姻,俨然成一集团。及太平军踰岭而北,彼等皆际会风云,展其骥足,足为理学吐气”。^④韦政通的《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

①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96页。

② 《读史兵略》编辑者为汪士铎,分辑者为张裕钊、莫友芝等人。《皇朝一统舆图》先由胡林翼请人编成初稿,胡氏病逝后,再由继任湖北巡抚严树森请人补充审定。见陶海洋:《胡林翼与湘军》,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版,第150—163页。

③ 左宗棠虽然崇尚程朱理学,大量刊印理学著作,本人有所创发的却在舆地学、农学等实用学问上。见王继平主编:《晚清湖南学术思想史稿》,第198—203页。

④ 陆宝千:《刘蓉年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版,自序。

也强调曾、郭、刘三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频密的信件来往。^①他们之间的特别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们学术上有共同的渊源,而且经常互动。曾国藩、刘蓉和郭嵩焘年青时都肄业岳麓书院,从游山长欧阳厚均,罗泽南则肄业城南书院,从学贺熙龄,两家书院都在长沙,学风也比较接近。后来即使军务、政务繁忙,他们也不时通过书信切磋学问,彼此之间仍然有共同关心的经典和学术问题,陆宝千和韦政通都认为“以礼经世”的口号虽然由曾国藩提出来,其他三个人也都有类似的主张。^②

其次,除了彼此问学,他们还保持亲密的私交。曾、刘、郭三人不仅是岳麓的同学,道光十六年相聚以后更成为终身不渝的好友。罗、曾、刘三人都是湖南湘乡人,罗泽南和刘蓉早在道光十八年(1838)就因为学术上的投契订为莫逆之交。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受命组训湘勇时,罗泽南是最早的合作者。罗泽南战死之后,郭嵩焘帮他整理遗集,撰写年谱,可见二人也决非泛泛之交。另外,刘蓉为其子娶了罗泽南的遗女,又把女儿嫁给曾纪泽作继室,曾国藩也把四女曾纪纯嫁给郭嵩焘的长子郭刚基,把三女曾纪琛嫁给罗泽南次子罗允吉。这就是陆宝千所说的“先之以友朋,继之以昏姻”吧。

第三,他们在事功和学术上既有许多共通之处,也有若干细微差异,因此通过对他们的研究,既可以考察湖南理学家“以经术为治术”的共性,也可以考察其中不同流派的特性以及不同流派之间的联系和转化。就事功而言,他们都参加了平定太平军的战争。不同的是,刘蓉和罗泽南不曾涉及洋务,他们处理的问题基本上还

① 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上,第385—392,437—443页。

② 陆宝千:《清代思想史》,第429—433页;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第369页。

是在传统的范围之内。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和主持自强运动的过程中,与西方人有了一些接触,也提出了自己关于洋务的一系列主张,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跨入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敏感的中外关系领域。郭嵩焘的一生更是与洋务息息相关,他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被派到西欧去本身就有破天荒的意义,他对中国对外传统的反思、对平等外交和万国公法的提倡使他成为湖南理学家中最接近现代世界的人物。

就学术而言,湖南理学家的共性是通过重新解释程朱理学的基本文献和核心观念为保卫或重建儒家的基本道德和政治秩序寻找精神动力和理论资源,同时兼容考据学、史学和早期“经世学派”的长处。他们也都对礼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相比之下,刘蓉和罗泽南较为坚守程朱门户,而曾国藩和郭嵩焘则对文史和考据表现出更多的兴趣,后者驻欧期间甚至开始接触到西方文明一些实质性的内容。把四个人放在一起分析,我们便可以在相似中发现差异,在延续中发现变化,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湖南理学家运用儒家传统学术的观念,处理近代史上“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所能发挥的潜力和极限分别在哪里。

2. 湖南理学家的传统学问与政治事功：以经术为治术

我认为晚清湖南理学家经世致用最重要的特色可以用“以经术为治术”概括,这个说法的直接来源是魏源的名文《默觚》:

道形诸事谓之治,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

諫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诤厉者乎？^①

此处魏源的本意是通过回顾儒家传统理想，批评乾嘉考据学无益事功。根据引文，“以经术为治术”即为将儒家传统学术，首先是经典研究的成果，运用于现实政治，解决从决策、司法、官制、治河到出使方方面面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魏源明确指出，“以经术为治术”不仅有益于内政，也有益于外交。实际上，晚清儒者考虑经世的问题，越来越不能忽略中西外交对传统秩序的挑战。另一方面，尽管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偏重官僚体系的技术操作问题，此处提及“以《周官》致太平”，说明他并不一定排斥从经典诠释中发掘大规模政治改革的根据。

类似的说法早见于熙宁二年(1069)春初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对话。神宗说：“朕知卿久，非适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②在王安石看来，讲求经学就是为治理政务寻找依据。“经术”不足以治理国家，不能转化为“治术”，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魏源引文中也出现了“通经致用”，这是一个与“以经术为治术”比较接近的观念，但是，这个观念一来今文经学的色彩较浓，二来含义也比较模糊：“致用”的“用”字可以理解为政事之用，也可以理解为修身之用。因此，本书选择“以经术为治术”为框架讨论晚

① 魏源：《默觚上·学篇九》，《默觚：魏源集》收入张岱年主编《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② 见(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九《王安石事迹上》，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卷38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4页。

清湖南理学家学问与事功的特色,希望强调的是:一方面,他们的传统学术,尤其是对儒家经典文献的解读,为他们在政治事功上的突破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他们的政治思想或政治主张也带有鲜明的儒家传统学术的印记。

魏源对乾嘉考据学的批评,体现了鸦片战争之前儒者反省考据学流弊、要求学术为实际政治服务的时代精神。但是魏源本人的学术却并不足以“以经术为治术”的主张树立典范。由他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着重的是“治法”的讨论,志在从技术层面解决官僚行政中遇到的具体的问题,而对经术本身没有提出深刻的见解,更没有把经术与事功紧密地联系起来。他所作的《诗古微》、《书古微》虽然有利于今文经学扩大影响,却不曾与经世之学发生直接的关联,《圣武记》、《海国图志》则是以史学、舆地之学表现其经世之志了,其贡献早有定论,却并不强调与经学传统的联系。

“以经术为治术”是儒家的一个传统理想。儒家的三个主要学术流派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理学都相信经典研究可以服务于现实政治,侧重点却各有不同。西汉今文经学首先把经典当成政治资源,“通经致用”的观念当时已经出现,但是古文经学兴起以后这个以“托古改制”著称的传统湮没了一千多年,直到清朝中叶常州学派兴起才重新发掘出来。魏源就是以常州学派为依托批评考据学主流无裨实用,但是他本人的经术和治术还是分为两橛。直到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才真正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然而正如葛兆光所说,当今文经学家“不断把经典神圣化为微言大义时,经学的权威性就从文本挪移到了注释,其真理意义就从经典本身挪到了注释者的诠释,经典被